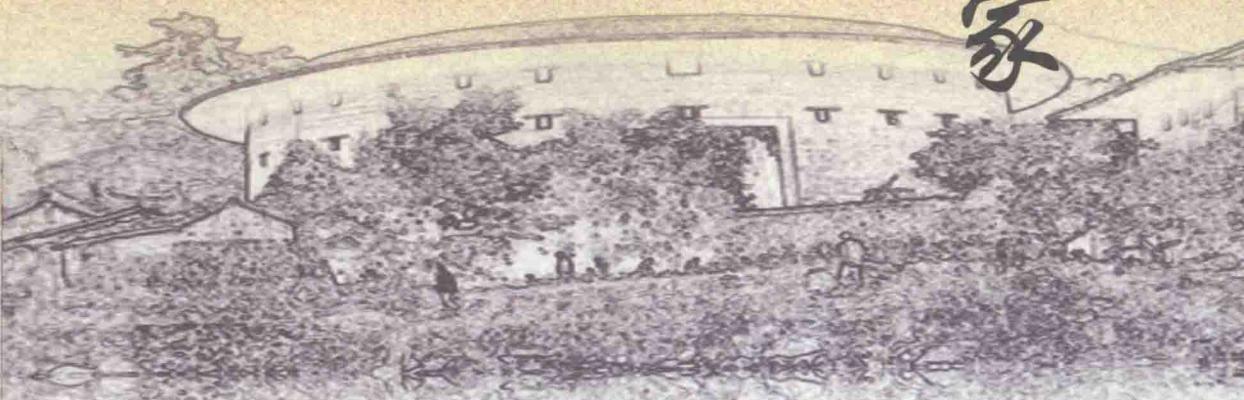


张佑周 主编  
闽西客家研究丛书

客家之子论客家

张佑周 著



四川民族出版社

张佑周 主编  
闽西客家研究丛书

客家之子论客家

张佑周 著

四川民族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客家之子论客家 / 张佑周著 -- 成都 : 四川民族出版社, 2011. 7

(闽西客家研究丛书 / 张佑周主编)

ISBN 978-7-5409-4827-6

I. ①客… II. ①张… III. ①客家人—福建省—文集  
IV. ①K281. 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151940号

## 客家之子论客家

---

作 者: 张佑周

封面设计: 林满华

责任编辑: 邹景阳

出版发行: 四川民族出版社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龙岩东方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字 数: 200千字

印 张: 11. 375

版 次: 2012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2000

书 号: ISBN 978-7-5409-4827-6

定 价: 30. 00元

本书为福建省高校服务海西  
建设重点项目“客家文化与闽台客  
家关系研究”成果之一

# 总序

李金莲

2010年2月13日，农历己丑年除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亲临上杭古田五龙村和永定客家土楼视察，与当地客家民众共度除夕。在五龙村，胡锦涛总书记饶有兴趣地为客家龙“点睛”，并与客家乡亲一起跳起欢快的客家民间歌舞“年年好，节节高”。而在永定土楼，胡锦涛总书记则深情地嘱咐土楼客家人说：“客家土楼是中华文化瑰宝，是大家庭、小社会和谐相处的典范，希望一定把祖先留下的这份珍贵遗产守护好、传承好、运用好。”总书记的视察和关怀给闽西客家乡亲以极大的鼓舞，总书记的讲话言简意赅，独到精辟，高屋建瓴，概括了客家土楼的文化内涵——“大家庭、小社会和谐相处”，明确地指示我们要将客家文化“守护好、传承好、运用好”。作为闽西客家祖地唯一本科院校龙岩学院的学者，贯彻落实总书记的讲话精神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闽西是客家祖地，是中华汉民族的独特民系——客家民系形成的地域。一千多年前，由于战乱或自然灾害等原因，中原汉人一波又一波南迁，特别是唐末至两宋期间，许多南迁汉人越过武夷山，进入闽西这片背靠中原、面向大海的特殊地域，在这一片相对封闭的特殊地域以先进的农耕技术开发、耕耘，并以先进的中原文化影响、融合并同化当地百越族土著，终于“反客为主”，客家民系于是在这一片地域形成并在其后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得到充分的发展。

作为伴随客家民系的形成而形成的客家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祖祖辈辈的客家人历经千年精心培育已经茁壮成长根深叶茂的参天大树。在现代化进程急速推进的今天，这棵大树仍然发挥着应有而巨大的作用，但同时也

需要我们继续精心呵护,才不至于叶黄枝败,才能继续保持郁郁葱葱。

从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我校(其前身是龙岩师专)学者就敏锐地发现,客家文化是本地颇具特色的文化,是我们这类院校的社科研究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资源。他们率先闯入这块在祖国大陆尚无人涉足的研究领域。他们从对颇具争议的现代著名侨领、成功的华侨工商企业家、本地区客家籍人士胡文虎的研究开始,并专门成立大陆高校第一个客家人研究的学术机构——龙岩师专胡文虎研究室,将研究成果结集发表在《龙岩师专学报·增刊〈胡文虎研究〉》上,以大量的事实推倒了一个时期以来强加在胡文虎先生身上的污蔑不实之词,为政府及有关部门在后来给胡文虎先生公正评价、恢复其爱国侨领的历史地位提供了有力的依据,在海内外引起巨大反响。

1988 年 6 月,我校成立大陆高校首个客家研究机构——龙岩师专客家学研究室(后改名“客家学研究所”),1989 年 11 月该所研究人员编辑出版《客家史与客家人研究》第一辑,送往当年 12 月中旬在广东省梅州市召开的世界客属联谊大会,赠送给与会客属同胞和海内外专家学者,引起巨大反响。新加坡《联合晚报》、香港《文汇报》、台湾《联合报》和北京《光明日报》等海内外媒体,纷纷对该刊及联谊会增加客家学研究这一全新内容进行报道,注意到“大陆兴起客家学研究”、“中国开展客家学研究”。这个不小的波澜,正是由我校学者的研究成果掀起的。其后,该刊更名为《客家学研究》,仍由我校学者参与编辑,并且编辑室设在我校,由上海人民出版社等正式出版,影响更大。1991 年 6 月,由我校学者李逢蕊主编的《客家纵横》杂志创刊,为我校及海内外客家学研究者开辟出一块新的园地。

我校学者在客家学研究领域辛勤耕耘,硕果累累。由我校学者参与发起及承办的“闽西客家学研讨会”(1991 年 9 月)和“首届客家方言学术讨论会”(1993 年 9 月)相继在龙岩举行更是进一步推动了闽西客家学研究的深入发展。我校学者还先后参加“上海国际客家学研讨会”(1991 年 10 月)、“香港首届国际客家学研讨会”(1992 年 9 月)及其后历届世界客属恳亲大会暨国际客家学研讨会。

2000 年 10 月,我校客家学研究所更名为“客家文化研究所”,学校将其作为人文学科重点研究所列入建设规划,并将客家文化研究作为地方特色文化研究课程列入文科有关专业的教学计划,我校客家学研究出现了崭新的局面,先后正式出版张佑周、陈弦章、徐维群编撰的教材《客家文化概论》(2002 年 5 月)和张佑周的《客家祖地——闽西》(2005 年 10 月)、林清书的《武平方言研究》(2004 年 8 月)等专著。

2007年1月,我校申报的以客家文化研究为主要内容的“民俗学”获省教育厅批准立项为“福建省新建本科高等学校重点学科”。2008年1月,我校以“客家文化研究所”为基础申报的“福建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基地(培育)——龙岩学院客家学研究中心”获省教育厅批准立项建设。2008年8月,我校客家学研究中心申报的福建省服务海西建设重点项目“客家文化与闽台客家关系研究”获省教育厅、财政厅批准立项。我校客家学研究中心参与策划并承办由国台办《两岸关系》杂志社和龙岩市委、市政府等单位主办的“客家文化与两岸和平发展”研讨会(2008年11月),参与协办由龙岩市人民政府和台湾中华海峡两岸文经交流协会主办的“第四届海峡两岸客家高峰论坛”(2010年6月)。同时还参与闽西客家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申报工作,为龙岩市委、市政府打造“客家祖地”、“海峡客家”文化品牌提供相关材料和相关建议,为龙岩市博物馆撰写“海峡客家”展区布展方案,为有关县、乡镇客家文化品牌建设提供咨询意见等等,为地方文化建设、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由著名客家学研究专家、我校客家学研究中心主任张佑周教授主编的这套“闽西客家研究丛书”是我校客家研究的又一丰硕成果,是我校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在2010年春节期间视察福建、视察龙岩时的重要讲话,配合龙岩市先行先试,打造“海峡客家”文化品牌,推进海峡两岸文化交流,促进海峡两岸和平发展的一个实际行动。

“闽西客家研究丛书”包括《闽西客家传统社会研究》、《客家之子论客家》、《海峡客家论集》、《闽西客家古代文学作品辑注》等四部专著或文集。

张佑周先生撰写的《闽西客家传统社会研究》通过大量客家文化事象透视闽西客家传统社会的形成、发展及其特征,探讨现代化进程对于闽西客家传统社会的冲击以及如何“守护好、传承好、运用好”“祖先留下的珍贵遗产”的问题。

《客家之子论客家》收录丛书主编张佑周近20年发表的客家学研究论文30篇,其中包括对于客家源流、民情习俗、民间信仰、语言文学、文化事象等诸多方面的探讨,观点独到,不乏一家之言。

《海峡客家论集》收入本校客家学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吴福文先生和张树廷先生近年来有关海峡两岸客家研究论文凡31篇。作者通过对闽台两地客家文化、人物特别是以往人们较少涉及的客家政治、经济、社会以及台湾政治生态中的客家因素等的研究,探析海峡两岸客家的渊源关系以及客家文化研究交流对于两岸和平发展的积极意义。

《闽西客家古代文学作品辑注》是我校客家学研究新秀兰寿春副教授关于客家文学作品研究的尝试之作,辑录自唐代至清末包括闽西客家籍作者以及在闽西为官作宦或流寓闽西的非客家籍作者有关人文、山水、民情习俗的作品,也有少数非客家籍作者涉及闽西的作品,还有部分闽西客家民间文学作品。体裁以诗歌、散文为主。尽管辑录者对所有评释都着墨不多,但观点独到,语言精炼,足见其扎实的古典文学研究之功力。

2009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从发展战略的高度提出将福建省及海峡西岸经济区建成“两岸人民交流合作先行先试区域”、“服务周边地区发展新的对外开放综合通道”和“东部沿海地区先进制造业的重要基地”的同时,特别提出要将福建省建设成为“我国重要的自然和文化旅游中心”。充分发挥海峡西岸经济区自然和文化资源优势,拓展闽南文化、客家文化和妈祖文化等两岸共同文化的内涵,不仅对于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且对于海峡东岸——宝岛台湾的发展以及对于海峡两岸的交流合作与和平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对整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由此看来,我校学者此前及今后所进行的客家文化研究,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张佑周教授送来丛书书稿嘱我作序。身为客家女,我欣然命笔。谨对我校客家学研究写下一些回顾性文字,并表达本人对客家文化研究重要意义的粗浅看法,就教于海内外客家研究专家。

(作者系中共龙岩学院委员会书记、研究员)

## 自序

我出生在闽粤两省交界处非常偏僻的永定县下洋镇翁坑美自然村，村口不到五里就是广东大埔县地界。至今仍未曾命名的汀江在永定境内最后一条支流金丰河的最后一条小支流从村东流过，在村口与金丰河汇合后流入大埔的西河，再流入原大埔县城茶阳镇的涛涛汀江。这条小溪流的上游有较大的村庄叫“东洋村”和“思贤村”，虽然居住人口都不过两千，但小时候的我却觉得它们都是很大的村庄，因为地名较“洋”，而且还设有中心小学。而我家村子翁坑美村原先的村名却略带贬义——温坑尾，既与“瘟”同音，又处于人们不屑一顾的所谓“水尾田”。于是，略通文墨的笔者家父便将村名改成如今的“翁坑美”，似乎美了一些，但笔者儿时去二里远的东洋中心小学上学时仍然受到一些同学的欺负和歧视，说我们是“瘟鸡村”人，幸亏笔者学习努力，成绩优秀，老师和同学们终于喜欢上我这个来自“水尾田”的小子。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翁坑美村人知道了在本村聚族而居的张氏梓叔和上下三村的乡里乡亲是客家人；也不知在哪年哪月，老爸老妈告诉我说：“我们是客家人。”于是，我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是客家之子，然而，我却搞不清楚“我们是客家人”究竟意味着什么。

终于有一天，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了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于是，终于有一天，偏僻的小山村来了几个城里人，他们被分开住到村里最穷的贫下中农家里。笔者家里虽然也很穷，但家庭成分是中农，自然没有分到据说是来自大城市厦门，要在村里“炼一颗红心，绣一辈子地球”的“学佬古”、“学佬妈”。于是，笔者终于又有了新的认识，就在不远的厦门、漳州等地，还有一类与客家人操不同语言的“学佬”人（福佬人）。但我还是搞不清楚“我们是客家

人”，“他们是学佬人”究竟意味着什么。

终于有一天，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作出了恢复高考的伟大决定，与那些来自厦门的“学佬古”、“学佬妈”一起绣了近十年地球的笔者终于考上了大学，像许多客家先辈那样背起行囊，告别了小山村，来到了城市。于是，我有机会“遨游在知识的海洋”；于是，我有机会留在高校搞起了学术研究；于是，我有机会进一步搞清楚“我是客家人”、“我是客家之子”究竟意味着什么。

正当我因为要完成领导分配给我的外国文学教学任务，也算很潜心于欧美文学的研究，陆续写出一系列也算有一些独特观点的“莎士比亚笔下的女性”的研究文字的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我所在的龙岩师专的一批学者发起了对本地区客家籍人士、著名华侨工商企业家胡文虎先生的研究，进而又发起了客家研究，并且成立了全国高校第一个客家研究机构——龙岩师专客家学研究室(所)。胡文虎先生是我的下洋同乡，这一研究一下子就激发了我的兴趣，而随后的客家研究热潮，更是触动了我长期以来一直想搞清楚“我是客家人”究竟意味着什么的那根神经。

于是，我在莎士比亚笔下女性研究之余，也试着研究深受世人赞誉的“天足宽胸”、勤劳能干的客家妇女；于是，我开始以外国文学研究的视角和方法，试图对客家文学艺术作更深入的研究，提出更新颖的观点；于是，我开始对罗香林、陈运栋等前辈学者的客家研究论著产生了极大的兴起，试图对生我养我的这一片土地和我曾经熟视无睹的所有的客家文化事象进行深入的对照考察与分析；于是，我终于有了向海内外各地频繁举行的客家学研讨会提交论文并参加会议的资本，终于在 1992 年 10 月于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香港首届国际客家学研讨会”上提交《客家民系的形成及其界定试论》的论文并发表大会演讲，提出从狭义和广义两个方面界定客家人的方法，引起学界的注目；于是，我充满信心地在客家学研究领域继续努力，一路走来，终于也算取得令自己满意的战绩。最为可喜的是，我终于为一直萦绕在自己心头的“我是客家人”、“我是客家之子”究竟意味着什么这类问题找到了比较完满的答案。

收入本丛书的《客家之子论客家》就是笔者近 20 年来试图回答上述问题所作的研究和探讨，虽然并非系统的研究，也并非唯一的标准答案，但涉猎面较广，试图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回答上述问题，也算能藉以逐步去除笔者胸中一个个块垒。而《闽西客家传统社会研究》则是笔者继《客家祖地——闽西》之后对笔者所处的客家祖地闽西所进行的更进一步研究的心得，也可算作笔者对自己所理解的“我是客家

人”、“我是客家之子”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一问题的更进一步的阐释。也许这一阐释仍然不够深入，笔者还需继续努力，但限于学识和水平，笔者此时也只能以此奉献给读者诸君，祈望批评指正。

是为序。

张佑周

2010年国庆于龙岩凤凰山

# 目 录

总序 .....	李金莲(1)
自序 .....	(5)
客家民系的形成及客家人界定试论 .....	(1)
简论客家民系形成于闽西 .....	(8)
试论客家文化生成的地理与社会条件 .....	(12)
试论现代化进程对闽西社会宗法制遗风的冲击 .....	(20)
筷子巷 石壁村 瓦子坪	
——客家人心中的圣地 .....	(30)
客家文化的基本特质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	(36)
永定土楼 心的家园 .....	(46)
着力打造文化品牌 提升海峡客家旅游竞争力 .....	(50)
闽西客家生殖崇拜事象举探 .....	(56)
试论客家民间信仰的传承与发展 .....	(60)
闽西与台湾客家民间信仰的传承与变异 .....	(67)
念祖思乡的心灵慰藉 筚路蓝缕的精神动力	
——随客家人闯世界的神灵 .....	(76)
定光佛信仰与闽西客家社会 .....	(83)
做好“定光祖庙”文章 凝聚海内外客家亲情 .....	(89)
高潮迭起 热闹和谐	
——著名侨乡永定下洋元宵灯会记忆 .....	(98)
闽西客家端午节习俗漫谈 .....	(101)

闽西客家民间禁忌举探	(105)
郑和、王景弘下西洋与客家文化的海外弘扬	
——纪念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	(113)
弘扬客家爱国传统 促进两岸和平发展	
——客籍名将刘国轩辅郑治台并力促台湾回归的历史贡献	.....
	(120)
“文开淡北”第一人	
——论客家先贤胡焯猷对北台湾开发之历史贡献	(126)
论罗香林在客家学研究中的历史地位	(130)
胡文虎的成功与悲剧	
——简论传统文化对胡文虎的影响	(134)
爱国爱乡 一脉相承	
——胡文虎、胡仙的恋乡情结	(141)
奶奶和妈妈的故事	(144)
客家话形成于汀江、韩江流域	(147)
浅谈下洋话中的外来词	(159)
丰富多彩的下洋客家歇后语	(163)
借西方新奇手法 抒客家游子情怀	
——评象征派先驱李金发及其诗作	(168)
后记	著者(178)

## 客家民系的形成及客家人界定试论

在我们历史悠久、文明鼎盛、地大物博的中华大地，休养生息着五十六个兄弟民族。在这个多民族的大家庭里，占人口 93% 以上的人是被统称为炎黄子孙的汉族人。众所周知，汉民族的摇篮是黄河流域。早在远古时代，炎黄子孙就在那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华夏文明。随着历史车轮的滚滚前行，汉民族又拓展、开发了长江流域以至东北、西南和江南蛮荒之地。于是，由于历史、时代、地域、环境等等原因，先后因躲避战乱、自然灾祸等原因而向南方迁徙拓展的汉人，自然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各支民系，如江浙系（又称越海系或吴越系）、湘赣系、湘桂系、粤海系（或称广府系）、福佬系、客家系等等。这些民系大多以聚居地命名，唯独由于中原汉人多次南徙而形成并主要聚居于闽粤赣三省结合部的赣南、闽西、粤东（俗称闽粤赣边区）的客家民系特殊。它非但不以聚居地命名，甚至连“客家”这一名称的由来也无典可寻，以至于在客家学研究界至今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恐怕将成为千古之谜。为何称“客家”？本文不想作深入的探究。何谓“客家人”或者换句话说，哪些人是“客家”？以及客家民系是何时何地形成的？对于这两个问题，笔者则不揣浅陋，愿以不成熟的看法就教于海内外专家、学者和同仁。

何谓客家这个问题看似简单，提出来似乎有故弄玄虚之嫌，身为客家人的笔者，早在孩提时代就知道自己是客家人，也从未对自己的客家人身份有过任何疑问。然而，近年来涉足于客家学研究领域之后，却惊奇地发现，要搞清这个问题也绝非易事。具体判别某一人物尤其是历史人物是否客家人时则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时竟也能在学术界掀起轩然大波。如对一代伟人孙中山先生是否客家人的论争，就从罗香林在 1942 年发表《国父家世源流考》开始，至今仍波澜迭起，未有竟时。于是，笔者以为，有必要从理论上对客家人成份给予较为明确而严密的界定，以利于客

家学研究的健康顺利发展。

其实,这个问题也并非新的课题。早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客家研究大师罗香林先生就已注意到这个问题,为这个问题所困扰,而且还曾构想以西方人种学的方法,对客家人与其他民系的人在形体、血型和智力等多方面进行抽样测试并加以比较,以求出某些指数,从中得出客家人在人种学上的特异,从而看出客家人与其他民系或民族的区别;<sup>[1]</sup>当代日本学者板元宇一郎在《面相与中国人》一书中,在谈到中国人的相貌时,也大谈客家人的相貌特征,并用图示加以说明,试图让人们凭此去识别何谓客家人。然而,无论是罗香林的带着自然科学研究色彩的并在理论上确乎完美的大胆构想,还是板元宇一郎的貌似简易的直观相面术,于实际都无多大意义。首先,客家人作为炎黄子孙的一支,与汉民族其他民系祖源相同,在形体、相貌等方面并没有什么特异,一般说来,中国南方人在体型方面似乎比北方人偏矮偏小,客家人如此,但福佬、广府人亦然。至于在血型、智力等方面的测定,且不说付诸实施并非易事,即使现代科学技术有可能很容易做到,诸如用DNA检测等可以进行亲子鉴定,却恐怕无法对某人属何民系或民族加以判别。因为同源同种的各民系的人,在血型、智力等方面也是难分彼此的,客家人有聪明绝顶的智者,却也有智能低下的愚者,其他民系也一样。况且,对于历史人物,这些方面的测试又该如何进行呢?恐怕只能由考古学家和医学专家合作去鉴别其骨骼、毛发乃至化石之类了。因此,罗香林的大胆构想只能付诸流水,板元宇一郎的良苦用心也显得肤浅乏力。

近年来,客家研究在海内外重新掀起高潮。如何界定客家人的问题再度进退维谷。国内客家学研究专家李逢蕊先生在《客家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二辑上发表了《客家人界定初论》一文,试图从文化学的角度去界定客家人,他认为必须从如下四个方面或者说四条标准去界定客家人:(1)“客家是汉民族中独特稳定的民系之一”; (2)“客家话是客家人的独特语言”; (3)“客家人有特殊的客家文化和习俗”; (4)“客家人具有独特的客家精神”。很显然,李先生的第一条是试图给客家民系下定义,其余三条说的是客家人的文化特征。这篇文章对客家民系的形成,客家人独特的语言、文化习俗,尤其是难能可贵的客家精神,作了精辟独到的论述,对于人们从宏观上界定客家民系,正确地认识客家民系,更好地弘扬客家精神,无疑有极其重大的意义。然而,如果用上述四条标准去界定或判别具体的某一个人

[1] 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自序》,众人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53年。

物是否客家人则仍然见仁见智,尤其是用以界定某一历史人物则更是困难重重。因为,身为客家人流寓外地较长时间后不会讲客家话者大有人在,而非客家人能讲流利的客家话者却也为数不少。再者,也并非所有的客家人一如既往地履行客家文化习俗或体现出鲜明的客家精神,而在非客家人身上能见出有如李先生所说的魂系故土、尊师重教、革命性、开拓性等基本特征和可贵精神者恐怕也绝非寥寥。

由于这个问题自罗香林以来一直未能在理论上或实际上加以解决,致使在客家研究界出现了某些混乱,尤其对客家人文的研究更甚。不少客家研究者在其著述中涉及到有关人物尤其是知名人士时,往往根据自己立论的需要,随意认定或臆造一条识辨客家成份的标准,把自己欲褒或欲贬的某个人物判定为客家人。于是,在有关著述中出现了将李世民、郭子仪、张九龄、朱熹、王阳明、曾国藩、毛泽东、李嘉诚等人都列入客家人的情况。上述这些尽管没有上升为理论而在实际研究中却在指导着对于客家人的界定和判别的认识无疑是十分错误的。我们姑且称之为“泛客家论”。之所以产生这种“泛客家论”并以之指导客家研究,其根本原因在于一些人采取实用主义的研究方法,各取所需,把某些关于客家人的现象当成了本质,把特殊看作了一般。甚至因汉人南迁而形成客家便将祖上曾经迁徙的人们或祖上曾经在客家地区居留却早已从客家地区外迁并融入非客家民系的汪洋大海中的人们统统认定为客家人。可见,他们起码忘掉了客家民系形成的特定的历史时限和特定的生存地域。如果照此认识客家,则中国南方汉族甚至所有炎黄子孙皆为客家。这样,岂不在实际上否定了客家民系这一独特而稳定的民系的存在吗?此外,与“泛客家论”相对的还有“狭隘客家论”,这种认识片面强调生活区域和语言习俗,认为凡是迁离了客家聚居地或不能操客家语的人就不是客家人。这种界定法虽然简单,然而却有不容忽视的极大疏漏,它起码根本否定了客家人在近代以来群体的播迁拓展和个体的外出谋生,也从根本上否定了国内非客家地区以及海内外的客家社区或所谓“客家岛”的实际存在。因此,这种认识无疑也是极端错误的。

笔者以为,如何界定和判别客家人的问题,虽然并不简单,却也不是十分复杂。我们只要借用民族学的基本理论并且对客家民系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行一番考察,搞清楚客家民系形成的历史时限和特殊地域之后,这个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因此,我们必须先解决客家民系是何时何地形成的这个问题。

民族学理论认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

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sup>(1)</sup>诚然，民系与民族有一定的区别，但它们之间除了祖源的从属与独立这一较为明显的区别之外，两者都是以上述四个“共同”作为基本要素的。只是民系作为一民族的分支，除了具有母族的语言、地域、经济生活和心理素质诸共同要素外，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还会产生自身的诸多特征，从而与母族的历史、文化诸特征既同又异、同中有异，以区别于同一母族的其他兄弟民系，显示出自己的独特性。就客家民系而言，在“共同语言”方面，客家人除使用汉字这一汉民族共同的书面语言外，不少语言学家早已考证出客家话与中州古音韵息息相关，却又在语音、语汇、语法方面自成体系。因而认定客家话为汉语方言之一。在“共同地域”方面，客家人休养生息之地，自秦汉以来就是中华民族中央政权管辖的范围，但地理环境却又是中国南方特殊的丘陵山地，而且这片土地曾经是苗、瑶、峒、蛮、山都、木客等百越族土著的世袭领地；在“共同经济生活”方面，客家人长期以来都以汉民族的传统的农耕经济生活为主，但其耕作对象与生产方式又与汉民族其他民系有诸多的差异。其中最突出的是客家人基本上以家庭或家族为单位进行梯田水稻种植，而极少如北方中原那样有大地主大庄园式的生产，也很少有其他杂粮或经济作物的种植；在“共同心理素质”方面，尽管客家人在宗教信仰、伦理道德、婚丧礼仪、衣食住行等文化意识和行为表现方面与中原汉族表现出极大的相同性，但由于迁徙生活和生存环境所决定，又使客家人不得不在许多方面弃旧图新以增强活力。如在服饰方面，由于客家地区山高水险、道路崎岖，致使客家人无论贵贱都放下了北方豪门士族的骄傲，普遍摒弃了显示高贵的长袍马褂和女性的长裙，不论男女，都穿上适于山地农耕的紧身短衣裤。同样，客家妇女也不像其他民系的妇女那样缠足束胸，而一个个天足宽胸、自然健美，别有一番风采。

客家民系的四个“共同”形成的特定地域是闽粤赣边区，换句话说，客家民系形成的特殊地域就在这一片地区。这一问题在客家研究界似乎别无异议，笔者也不想多加赘述。因为客家人聚居的最大地域是这一地区，这一地区几乎集中了所有的纯客家县市，达三四十个，总人口有二千多万，占大陆客家总人口的一半以上。因此，这一地区理所当然地被称为“客家大本营”。而客家民系的四个“共同”形成的历史时限这个问题则比较复杂，除运用民族学基本理论外，我们也许还需运用社会发展

(1) 《斯大林全集》第二卷，第294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